

中江丑吉 中国

〔美〕傅佛果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江丑吉在中国

〔美〕傅佛果 著

邓伟权 石井知章 译



创于1897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江丑吉在中国/(美)傅佛果著;邓伟权,石井知章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7416-2

I. ①中… II. ①傅… ②邓… ③石… III. ①中江
丑吉(1889~1942)——生平事迹 IV. ①K833.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6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江丑吉在中国

〔美〕傅佛果 著

邓伟权 石井知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416-2

2011年6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½

定价:22.00元

Nakae Ushikichi in China: The Mourning of Spirit, by Joshua A. Fogel,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89. Copyright © 1989 by the Presidents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本书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授权，
根据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1989 年版译出

中文版序

自本书英文初版以来已经 20 个年头，距日文版问世亦已 17 个春秋。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本书的日译者阪谷芳直的去世。当我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完成此书之际，他是亲眼见过中江丑吉的仍然在世的几个人之一，那时中日研究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附属领域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它既不适合放在中国研究的题目之下，也不适合放在日本研究的题目之下。在中国和日本，现在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开展这一领域的工作。在大阪的关西大学，有一个松浦章领导下的完善的亚洲文化研究中心（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在杭州的浙江工商大学已创立了一个在王勇教授领导下的类似研究机构。在西方，甚至有更为长足的进步，尽管我们仍落后于我们的东亚同行。

尽管如此，我认为为中国读者出版本书或任何关于中江丑吉的书籍的中文版，仍然具有特殊意义。中江代表了一系列与我们关于战前和战中中日历史的许多假设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他于 1919 年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他在与五四运动相联系的示威游行中走上北京的街头，但他并非要加入示威者的队伍，而是要抗议示威者对被认为同情日本或与日本有某种联系的中国人的攻击，更具体地说，他是要保护并事实上挽救了五四示威者攻击的反面人物

2 中江丑吉在中国

之一曹汝霖的生命。中江还与那种幕后交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幕后交易曾是那些年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特色，曹汝霖也涉身其中。此外，中江不同于其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他是当时最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之一。

这样一个人物，并不适合现代东亚史的通常叙述框架。中江深受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成熟著作及许多其他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他写了深入探讨中国早期思想的论文。这些论文的成篇，不仅是仔细阅读当时能够看到的中国学一二手材料的结果，也是广泛阅读欧洲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的产物。但这些论文中只有一篇在他生前出版，其他的在战后不久才得以出版，他的书信和页边注释也随后出版。与认识中江者写的诸多回忆文章一样，我在此书之中也试图写一个不平凡人的评传，一个不知名于当世、但其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人的遗产可谓巨大的人的评传。

本书原版的副标题“精神的悼念”，在日文版中没有体现，它出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著名的一段。黑格尔在这部中江如此喜爱的难解巨著中的那段里写到，一个时代的“精神”(geist)在一个新时代代替它时哀悼自己的逝去。当人类精神自身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接近自我实现之时，那是一个新时代将代替旧时代的令人鼓舞的信号。这是一个难以阐述的题目，但我仍然要强调的是：尽管中江生活和写作在一个令人恐惧的时代，他仍然相信日本及其盟国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一个在其中男女作为自由人生活的自由和能力将会实现的世界必将出现。他没能活到亲眼看到这个世界，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这个世界迄今仍未完全实现，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已从20世纪40年代初的黑暗岁月

前行了很长一段距离。

中江因其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坚定信念及他不顾包围他的逆境而坚持这一观点的事实，在战后日本备受推崇。因为他的日常所需由曹汝霖关照，他不必为衣食所愁；因为他生活在海外，他不必害怕“特高”监视他的行动和来敲他的房门。尽管如此，在中江在北京度过平静生活的许多年中，他从未对任何人隐瞒其观点。那些在北京认识他的人清楚地知道他对当日所有最重要的问题的看法，他甚至试图使他在日本军队中的熟人确信他们行事方法的错误。

对试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其生活和国家的日本人来说，中江提供了一个在艰难时代过一种充满尊严生活的一个普通日本人的实例。这样，建立珍视人类生命的战后民主任务就不必从头做起。生活在后民族主义世界中的我们能从中江的经历中吸取到什么？能否吸取到甚至对徘徊在我们这个时代上空的新“精神”有益的教训？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陈述之易正如其实行之难。在本序言的末尾，我谈一谈我努力寻找的中江丑吉和他更为著名的父亲中江兆民之间的联系，后者（一个著名的法国文化爱好者和法语翻译家）曾被问及他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他回答道，他无疑将会支持起义者的目标并向巴士底狱进军，但如果让他看到国王路易十六被带到刽子手的绞首架上，他会尽一切努力冲过去并把他从即将发生的行刑中解救出来。这不是一个战胜暴君的社会正义问题，而是一个对普通人即将进行的伤害和可能杀害的问题。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样一种情感，天真、费解、无意义抑或巧妙，我相信我们从两位中江那里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4 中江丑吉在中国

他们都对这样的暴力深怀憎恶之意：一位是对在 18 世纪末期法国情况的想象，另一位则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确实地挽救了一个生命。

请允许我用一句对本书译者石井知章和邓伟权的无限感激之语结束本序言：我永远对他们感到亏欠。

傅佛果

2008 年 5 月 6 日于多伦多

英文版序

打算迫近中江丑吉(1889—1942)的人生和著作内部深处的这个研究,与我此前出版的关于内藤湖南(1866—1934)的著作一样,都是基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史是难以解开地缠绕在一起这一有用的假定而进行的^①。这个观点,对于一般地正确理解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的历史是重要的,而当我们评价在日中关系的文化领域占据关键位置的人物——像内藤和中江及其他无数人——之时,它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这个研究既非中国史的研究,亦非日本史的研究,而是把两者结合成一体的研究。

除个别情况外,研究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西欧历史学家都以其中一个国家为焦点,以用一连串的老生常谈来描述另一个国家为满足。而且,这些西欧历史学家从当事国的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受到了过多影响:中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首先把日本看作与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发展、活动有关联的国家;而日本的历史学家则倾向于把近代中国看作无法容忍的无秩序、没有管理、叛乱频仍,无意义的政权前后相继的国家。或许没有人否认这样的认识是近代日本与中国主要历史局面的中心。但主要的历史局面,并非历史的全貌。不管怎么说,历史学家都不应满足于拙劣的模仿。

除了为中国或日本其中一方吸引的人们的个人偏好外,学术

6 中江丑吉在中国

上的分工也妨碍了把两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在东亚几乎所有大学,中国史和日本史都作为不同的学科分别教授。在西方,人们不得不学习中、日两种语言,研究这两国的历史学家即使在一个系中任教,但两者之间几乎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对话。尽管如此,我们要想理解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之时,无视另一国家的历史或将其戏剧化,都将使我们一无所获。

30 多年以前,马利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以其著作《日本人和孙逸仙》^②在日中关系史的文化、政治领域的研究中,为后学开辟了道路。包含在这一相当重要著作中的言外之意,过于难解,以至不为西方和东亚的多数学者所接受。孙逸仙(孙文)深受日本人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在其提倡者中也有后来提倡日本帝国主义主张的——的影响。这相当于褻渎“国父”之名,但那却是真实的。

最近几年,入江昭、蒲地典子及其他人的工作便是开始着手研究许多存在于日中关系深处,但迄今尚未有人触及或未被恰当处理的问题。^③我们才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较轻程度上在中国台湾,对中日关系文化领域的历史探究,事实上到最近尚不存在。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以已经出现的为限,这种历史探究开始以一种历史性自传的题材出现。实藤惠秀及竹内实那样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很早以前就对此类问题给予了注意。尽管如此,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给亚洲全体带来的战争负罪感,使日本学者对帝国主义以外的中日关系的任一领域的认真研究难以进行。这个状态现在终于正在改变。

在超过 1500 年的时间里,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方面相互

影响。即使近代西方侵入以后,在西方诸国中也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或日本的影响超过了中日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中日两国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逐渐密切,过去的仇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缓和。重新审视两国共有历史的气氛,在两国内部也会不断加强。在西方,成问题的是:第一,存在这样的倾向,允许以知识的一时流行趋势来决定在历史论述中研究何种问题及使用何种解答方法;第二,存在这样的前提,把认识到从比较论的视角来研究的必要性等同于将其应用于实际或完成研究。如果对近代东亚史的这方面予以更大注意,我们对中日两国历史的理解将会更进一步。在我们自身对有关东亚的研究处于发展中的这一关键时刻,如果不能那样做的话,我们西方的观点就会受到限制,而且止于狭隘。该是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马利乌斯·詹森在研究中着手之处的时候了。

注释:

① 参照 Marius Jansen, “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收于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 11 卷“*Late Ch'ing 1800—1911*”第二部(Cambridge, 1980)第 339 页。

② Marius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Mass., 1954). 参照其近著“*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Chicago, 1975)。

③ 参照诸如 Akira Iriye[入江昭],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ss., 1965); Noriko Kamachi[蒲地典子],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ss., 1981) 及 Akira Iriye 编“*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 1980) 中的几篇论文。

序 章

在许多点上，中江丑吉(1889—1942)是同时代人中的一个例外。尽管他被赋予了在日本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却把这一切都拒绝了。他生长于明治时期(1868—1912)最后的20年中，在充满活力的大正时期(1912—1926)成人，他自己有意识地把日本完全舍弃。在中国，他成了市井学者，如果他把其有革新性的中国学论文公开出版，获得与其学识相适应的名声也未可知，但他拒绝了一切出版的申请。他放弃了日本的生活，又拒绝了学问的世界，选择了在庶民之中作为一个半是隐者的脱离故国者而生活的道路。

是什么使一个人采取了那样的行动？他又如何能够在大正自由主义之中看到昭和(1926—1989)超国家主义的根源？中国这样一个正逐渐加速滑向政治、社会、经济崩溃深渊的国家，何以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些都包含在本研究试图回答的诸问题之中。甚至比这些问题更核心的是本书对他这样一个脱离故国的日本人而做出的考察，他在中国生活近30年，凭借其独特的距离感和异常的洞察力注视着中国的革命、日本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事件的出现并在他眼前展开。其间，他保持着对日本的形势发展像外科医生那样尖锐的批判见解和对全部局势的一贯反对意见。他在半是自我“判罪”的流放国外的整个期间，一直努力从

2 中江丑吉在中国

逻辑上、哲学上理解世界正往何处去，而这又会给未来带来什么这样的问题。

中江生前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他避免受到社会的瞩目并拒绝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尽管有一个例外)所造成的。在他于1942年死后，伴随着太平洋战争在1945年结束，他的著作和书简出现在日本书店的架子上，人们开始关注他。日本一流的评论家桥川文三热情洋溢地叙述了这种关注的实际情况：“它的实质存在于对像化身为世界精神那样的历史灼见和人性的无限信赖和热爱之中。”^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社会想探索战前时期与日本军事机构在亚洲的成长之间的关系不足为怪；而且，日本人为揭示谋求在战后时期构筑的民主主义的根源而寻求丧失的机会，未能采取的手段，起初就清楚事态发展的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战前未曾试过的对问题的处理方法也并无任何不可思议之处。中江正好提供了一个无论如何也要过一种绝不违背自己价值观生活的人物的例子。对他来说，这即使意味着不得不舍弃生身之国，不得不预言并欢迎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那时的情况也让他不得不如此。这种价值观先于一切的态度和其价值观本身给有名的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以深刻的印象，他说在自己遇到难关之时有时便想，“如果是中江君的话，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做呢？”^②

由桥川提起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本研究中心问题的问题点是：中江是如何将其人生富有特色的诸侧面(像脱离故国者、中国学学者、哲人、政治评论家那样的)与对人性无限的信赖与热爱结合在

一起的。一般来说,在一个人青年时代所受的影响中,可以看出其成年后人生的核心。我在中江的青年时代与大学时代中,看不到对其人生目标之类或其他什么起作用的东西的一鳞半爪。他的父亲中江兆民(1847—1901)是明治时期与日本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之一。构成作为有名的个人自由拥护者和卢梭翻译者的父亲与丑吉间关系的特征是什么呢?兆民在1901年死去之前,对丑吉具有永久性影响的又是什么呢?

12岁失去父亲的丑吉,如果在他于191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之际,选择正常的出路的话,他的出人头地是有保障的。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却毅然放弃了传统的出人头地的轨迹,去了作为袁世凯政府角落中的一个秘书应该去工作的地方——中国。数年艰难困苦的结果,他于1919年左右度过了个人危机,随后开始显现后来如我们所知的中江丑吉的形象。是什么引起了他人人生中这样引人注目的方向改变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在中国继续生活——这在知识领域活跃的 Japan 大正时代、政治上混沌一片的中国共和时代,是超出一般的异常行为——的决心?我们应对此给予极大的注意。

在对 China 经典经过多年的独自研究以后,中江试着写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长达200页的论文。有许多理由需要关注这篇论文。论文丰富的构想力、比较论的视角、对分析的逻辑的充分注意便是要特别提到的几个理由。中江在此篇论文及其他数篇中国学论文中,作为对中国经学传统的处理方法,为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从德国哲学,尤其是德国唯心论哲学中借用了体系,但这种借用却是有选择性的引入。他利用了什

4 中江丑吉在中国

么,又是如何利用的,便是本研究这部分的主要论题——如果说这些论文有什么永久的重要性的话,我想就在于此。

尽管他的大部分著述处理的是中国思想的历史及其重新解释,他载于学术杂志的唯一论文却是关于完全不同主题的。它就是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制度这一古老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社会史上最有魅力也是最令人心烦意乱的问题。尽管这篇论文中的许多分析可能已落后于时代,但它包含的中国村落社会性质及共同体问题的理论结构,却对日本的中国学界的几代人都发生了影响。对此的论争现在仍在持续,尽管这已和中江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为什么中江感到他不得不埋头于像他所做的那样细小且往往琐碎的中国学研究?为什么一个对把自己卷入其中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深表关心的人却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开《尚书》之谜?中江将对中国经典尤其是《尚书》的何种独特的视角引入了他的学问之中,而这种视角是否与中江对更广泛事物的关心联结在一起?已故的中国文学学者竹内好(1910—1972)完全认识到了中江学问的重要性,他做了如下评论:我认识到自己与其说为作为学者的中江丑吉所吸引,还不如说我为作为人的中江丑吉所吸引,当然这两个问题不容易分开,也不应该分开。^⑤

中江兆民为法国政治思想所吸引并对法兰西文化充满仰慕之情,丑吉却为德意志哲学(尽管不是为德意志文化)所吸引。他尤其从德意志唯心论哲学传统中像康德、黑格尔那样的伟大思想家那里获得灵感,也从卡尔·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中获得灵感。但他对这些著作的赞赏终身都是批判性的,因为他在它们之中发现了

他不能同意的成分。中江是怎样理解并利用这些及其他思想家（像马克斯·韦伯）的？他们对他们著作的研读又是如何影响他的中国学理论的？德意志唯心论哲学传统又对中江自己的哲学思想造成了何种影响？

尽管中江没有写过哲学著作，我们却可以从他写的东西——他的论文、书信、记录下来的谈话、读书笔记中提炼出相当于生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某种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探讨中江基于对人性未来的无限信赖而创造并实践的哲学努力。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才能试着理解造成他的反战论，他对日本对亚洲大陆军事侵略的严厉批判以及他作为脱离故国者寻求在中国生活的诸种理由。不幸的是，事情的全貌并非整然一体。中江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中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令人失望之处以及不洗练的部分。但是，他对人类生命的非常强烈的尊严感却是一个永不衰退的因素。

战后的日本评论家认为，中江身上最可贵之处便是他的人类生命价值这一概念，很难想象比这更为高明的观点。他置1930年代种种逆境于不顾而对这一观点的坚持、他拒绝像许多左翼日本人一样向右翼日本当局妥协、他以不超出常人的方式对人性信赖的实践都使他成为照亮将战前日本同战后日本分割开来的黑暗之境的灯塔。剧作家木下顺二在谈到自己如何为中江所吸引时写道：“丑吉的人生正是真实戏剧的素材。”^④

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丑吉在很多点上与兆民不同。他过着隐士般的安静生活，而他的父亲却是整个明治时代有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他的父亲却著述等

6 中江丑吉在中国

身。但是，他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一对人类的核心信仰，尽管他是在不同的思想传统中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对兆民来说，这个观点包含着保证所有人的个人自由的内容，即使这意味着背离他曾普及于日本的法国知识界传统的一部分的一神论。尽管如此，两人都把人类生命视若珍宝。据说兆民在临终之时曾对他的忠诚弟子幸德秋水说过：“我当然是赞成(法国)革命的。但，尽管如此如果让我坐视国王路易十六踏上通往绞首架的台阶，我会义无反顾地跑过去撞倒刽子手并帮助国王逃跑。”^⑤ 守卫人类生命——不管是谁的生命——高于其他一切这一信念是丑吉与他父亲的共有之物。

注释：

① 桥川文三「抵抗者の政治思想」，收于『橋川文三著作集 6』，筑摩书房，1986 年版，第 255 页。（同书第 250—251 页，在对抵抗者思想进行分类时，将中江归入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型中的依据马克思主义进行抵抗的亚型——译者）同样的肯定评价请参照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第二次世界戦争と日本』，岩波书店，2002 年版，第 136—137 页。（同书第 352 页还有对中江的论述——译者）

② 长谷川如是闲「中江丑吉五回忌記念会での追憶談」，载于阪谷芳直编『中江丑吉という人』，大和书房，1979 年版，第 253 页。（以下前者简称「追憶談」，后者简称『という人』——译者）

③ 竹内好「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真理追求の人間的情熱」，载于阪谷芳直、铃木正编『中江丑吉の人間像』（以下简称『人間像』——译者），风媒社，1976 年增订版，第 318 页。

④ 木下顺二「どこにドラマは成立つか」，载于『という人』，第 27 页。

⑤ 幸德秋水「兆民先生」，岩波书店，1960 年版，第 38 页，并参照松永昌三在「五つの問答体：兆民の方法」中对兆民这一言辞的有趣评价，载于木下顺二、江藤文夫编『中江兆民の世界』，筑摩书房，1977 年版，第 137 页。